

护国战争的军事战略

孙长忠

(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学报编辑部,河南 郑州 450008)

摘要:护国战争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图谋,保护了民主共和制度,具有革命进步意义。但在军事上,多路进攻兵力过于分散,特别是在四川这个主战场上,未能达到占领叙州与泸州等地,进而攻占重庆,特别是护国军将领过早宣布举义,战争准备不够,且战略设想与主客观条件不尽相同,战争过程中兵员、军械和粮饷补充不及时,这一切都最终导致护国战争在军事上没有完成预定的战略目标。

关键词:护国战争;军事战略

中图分类号:K258.3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2-6320(2005)05-0037-03

护国战争是1915年12月至1916年6月以云南护国军为主体的旨在讨伐袁世凯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一场革命战争。在政治上,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,保护了民主共和制度,但在军事上,护国军却因种种原因,最终没有完成预定的战略目标。在此意义上说,护国战争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。以前有关护国战争多从政治角度进行研究,本文拟从军事角度对护国战争的得失问题进行探讨。

一、护国军的战略设想和兵力部署

早在滇军的第三次秘密会议上,罗佩金就曾拟定过一个作战方案。“罗乃计划以滇军一、二两师编为一军,军分为三梯团,借剿匪为名,将第一梯团运动至四川叙州附近,第二梯团运动至泸州附近,第三梯团运动至重庆方面。出其不意,一举攻占叙、泸、渝。三镇既克,四川既全在掌握,然后宣布云南独立,反对帝制。另遣第三师帮助贵州独立,出湖南沅晃,谋会师武汉,并决定唐坐镇滇中,而罗佩金为第一军军长,殷承献为参谋长出川,又以邓泰中为第一梯团的第一支队长,杨臻为第二支队长,假名开往镇雄剿匪,先行往川边移动……俱于十二月八、九、十日自云南开拔。”^{[1](P36)}在这个作战方针中,罗把战略进攻方向定在四川,作战攻击重点定在叙、泸、渝三处,对袁公开宣战的时机,则定于占领全川之后。这个作战方针,都有利于护国军而不利北洋军。

但罗佩金主持拟定的作战方针并没有得到完全实行。

蔡锷抵昆明后,给梁启超去电报告云南准备起义的情况。不久,接到梁启超自南京的回电,声称由于外交上的某种原因,讨袁通电应该早发。于是,云南决定提前宣布独立。12月25日,唐继尧、蔡锷、李烈钧等召集云南各界集会,宣布云南独立,并联名通电全国。这样一来,打乱了原来拟定的“出其不意,一举而占叙、泸、渝”,尔后宣布独立的方案。蔡锷等人来不及将分驻在云南各地的军队集结起来进行整编和动员,便命令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战区开进。护国军的兵力部署是:

1. 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,指挥四个梯团约7000人入川。该军分三路,以第一梯团长刘云峰,指挥早已运动到川

边的杨臻、邓泰中两支队和随同四川的熊克武川军支队为左翼,出昭通,取叙州,相机进迫成都。以戴戡率一支队东趋贵州,策动贵州护军刘显世起义讨袁,然后率云、贵军出松坎,攻綦江,而后夺取重庆,此为右翼。蔡锷自率赵又新、顾品珍两梯团为中路,出叙水,经纳溪,取泸州,然后顺流东下,夺取重庆。

2. 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,率两个梯团约6000人入桂。该军拟以一路东下广州,进逼闽、浙,一路由柳州向桂林,过衡阳,攻取长沙、岳阳,与第一军会师武汉。

3. 以唐继尧为护国军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,率6个梯团,拟借道贵州,出辰(辰溪)、沅(沅陵),取常德,与第一、二军会师武汉后再向北发展。战争初期,拟先派徐进为先遣队长,率千余人出贵。继而又编成挺进军一路,以黄毓成为司令,统带两个支队,在先遣纵队后跟进。

4. 委国民党党员熊克武为四川义勇队总司令、程潜为湖南招抚使,分别回川、湘两省,收集讨袁武装,发展军队,开展敌后战场。

但这样多路分兵,四面出击,给后来的作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。且滇军分驻各地,集结不易,行动迟缓。以第一军中路为例,宣布独立20天后,蔡锷才离开昆明出发,又隔一个月后,中路主力部队才陆续到达纳溪前线,当蔡锷1916年2月23日抵达纳溪时,袁军主力早已运动到泸州,组成了坚固的防线,使董鸿勋先遣支队初战失利,逼迫蔡锷中路由原订进攻战略仓促转入防御作战,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。

蔡锷本人对初战失利极为痛悔,曾在给梁启超的电报中多次提到“此次出征,出师计划未能大畅,实因宣布过早,动作缓慢,出师计划未尽协宜,以至与京津所预想者竟相凿枘”^[2](致梁启超一电)]。表明蔡锷对仓促提前宣布独立的战略失策也已有所认识。

二、护国军领导人之间的战略分歧

当云南宣布独立后,袁世凯马上调兵应战,他在新华宫丰泽园组织“征滇临时军务处”,亲自主持对滇军事。

1916年1月5日,袁世凯发出命令,饬靠近云南各省将军、巡按使对护国军“一体严筹防剿,毋稍疏忽”,并派虎威将军曹錕督率各师“扼要进扎,听候调用”。在此基础上又

拟定了三路进兵计划:

1. 湘西方向:以马继曾为司令指挥湘西、河南、奉天、安徽等各处兵力约2.6万人,拟向辰溪集中,然后从湘西出贵州,从侧翼攻滇。

2. 四川方向:以张敬尧为司令,指挥南苑、岳州、南昌、保定等各处兵力,加上川军两师三个混成旅、总数约4.5万人,为北洋主力军,拟先集结于重庆,然后从泸州突然进攻云南。

虎威将军曹錕为第一、二路军总司令,负责指挥湘、川战争。

3. 桂粤方向:龙觀光率一师入桂,胁迫广西都督陆荣廷共同攻滇,企图抄袭护国军的后路。

从敌人部署看,四川泸州是敌人主攻方向,湘西、桂方面为助攻。只要打垮入川这一路敌军,其他两路可不攻自破。护国军方面,其基本战略企图是:三路出兵,夺取武汉,然后向纵深发展,逼迫袁世凯下台。但如何实现这个战略企图,即在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上,护国军领导人之间曾出现过分歧。唐继尧等主张:“以云南为根本,奋师东征,以一支由辰沅进新化,取长沙;以一支由辰沅下沉水,取常德、长沙,据岳州、洞庭之险,以有武昌。”^[3](P123)]李烈钧则主张以重兵向东南以“虎视全粤”。他认为“东南各省,民精物华,海外交通形势便利,富庶可用,甲于全国”,应该“全力注射,力争胜着”。第三种意见是:“云南之险,不在云南,而在西蜀,以云南为根本,大举东上,以一支出叙泸进渝夔下宜昌、武汉;以一支出宁都,上岷洮……如是则形西南而忽据西北,天下视听,必且一新。”^[3](P127)]蔡锷比较倾向后一种意见,极力主张以四川为主攻方向,而把攻击重点放在泸州。因此,蔡锷决定分兵三路进攻四川而亲自指挥攻泸战役,打算“趁北方援军未抵川黔以前,速与作战,一举破之”。但由于北洋主力部队先于护国军赶到泸州,使战场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护国军的变化。

1912年2月中旬,蔡锷在纳溪前线打电报给唐继尧,根据新的形势,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。他说:“就现在局势观察,袁逆所称为最精锐之第七、八两师,悉驻泸、纳,此间若暂取守势,牵制其主力,而以重兵趋綦渝,甚属得机得势。渝既得手,泸逆后路既断,驱除自易。”^[2](《致唐继尧等电》)]蔡锷的意图是改变原来的三路出兵,主攻泸州的作战方案,而加强右翼的力量,改以綦江方面为主攻,抄袭重庆。蔡锷中路则变主攻为助攻,牵制袁军主力,策应右翼。从实际情况看,这个临敌应变的主张是正确的。当时,在护国军正面泸州,已集中有敌军张敬尧一个师、吴佩孚一个旅和川军第一师熊祥生旅,总兵力约15000人,都是装备齐全较有战斗力的部队,而蔡锷中路军总数为3000余人,加刘存厚师1500人和川边义勇军张阉义支队约900人,也不过5000余人,仅是袁军的三分之一。强攻泸州实属不易。而綦江方面,敌军仅李炳之旅和北洋六师齐燮元旅共约7000人,护国军右翼,如果按蔡锷的意见,合戴戡梯团、黄毓成的挺进军及刘显世的黔军一部,总兵力可达8000人,兵力略居优势。因此,改以此路为主攻,蔡锷的中路为助攻,突袭綦江而进取重庆的作战方案是可取的。但因唐继尧对此方案不加理睬,因而未能实行。

以后的叙、泸之战是艰苦的。从2月初到3月中旬,南、北两军在叙府和泸州、纳溪间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。打纳溪三进三出,攻叙府得而复失,护国军补饷不继,伤亡很重。幸亏蔡锷意志坚定,百折不挠,总算率疲惫之师抵挡住了北洋军的疯狂进攻。3月15日,广西的陆荣廷宣布独立,加入护国军。黔、桂响应护国,打乱了袁世凯三路进兵计划,断绝了袁军从侧背袭击云南的通道,保证了云南护国军

侧背的安全。云、桂、黔三省取得一致行动,壮大了护国军的声势,对袁世凯是个沉重的打击。在泸州前线的袁军司令张敬尧见形势急转,胜利无望,遂于3月22日与蔡锷停战议和。叙、泸战场呈胶着状态。袁世凯内外交困,走投无路,不得不于3月22日宣传撤消帝制,废除“洪宪”年号,宣告帝制破产。

但袁世凯并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,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,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。袁世凯新的阴谋,早被护国军识破,他们一方面暂与敌人达成停战协定,“虚与委蛇”,并坚持要袁世凯下台和提出惩办帝制祸首的主张。另一方面“赶紧筹划军备,以图大举”。

4月6日,蔡锷致电唐继尧,重申他的对川作战方针,指出:“就全川兵略言,叙泸方面宜主守,俟綦渝得手,或遇敌有隙可乘乃并力冲出。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,以必得为期。对湘亦宜取守势。”^[2](《致唐继尧等电》)]但唐继尧并不考虑蔡锷的意见,而是擅自制定了一个五路出师的计划,即将云南护国军扩编为八个军,除原来的两个军外,将黄毓成的挺进军编为第四军。又新组编四个军,即以叶荃为军长的第五军、以张子贞为军长的第六军、以刘祖武为军长的第七军和以庚恩赐为军长的警卫军。其新的作战部署是:以第四军配合第一军出川,第六军配合第二军出陕,第五军由会理、宁远(今西昌)方向出陕西,第七军由桂林出长沙,唐继尧自率第三军及警卫军从贵州攻湖南。各军会师武汉后,再向京师方向发展。这个不分主次的作战计划,看起来气势很大,实际上并不可取,立即遭到蔡锷的反对。4月6日,蔡锷再次致电唐继尧,坚持“以重兵趋綦渝”的方针,提出:“就现在形势论,兵出綦渝较易得手。现驻綦渝之逆军系第三师及第六师之各一旅,战斗力较弱,不难一战破之。至宁、远一路山川险阻,给养困难,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,临以重兵,甚属非宜。万一此路顿挫,川事可谓绝望。即使取得成都,而渝泸未下,逆军尚可源源入川,战争终难结局。鄙见不惟滇师宜以全力赴綦,即黔军亦应酌留一部协攻綦渝,俾奏肤功。”^[2](《致唐继尧等电》)]唐继尧在回电中,不仅仍坚持其五路出师的错误主张,对于四川战场,又荒唐地提出“以重兵出宁(远)雅(安)”的主张,企图否定蔡锷集重兵于綦渝的意见。对此,蔡锷即以坚决驳斥,指出:“以重兵出宁雅一议,不独于现在兵略上不甚宜,而停战期间,川湘境内均须按兵不动,是滇、黔之师只能增援前线,不能另辟途径也明甚。”接着蔡锷苦苦恳求“冀公俯采众议,将前说做罢,而以第二军主力及黄、赵两军迅速出綦渝,并准备第三军为各路策应”^[3](P123)],并自告奋勇,要求亲自移驻松坎,指挥綦江方面作战。

蔡锷把问题似乎看得太简单了些,即使此时唐继尧同意蔡锷的作战方案,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也不会掉转马头“速出綦渝”,更不会拨兵前来支援蔡锷。他此时也正在屡电唐继尧,宣传他的攻粤主张。后来证明,李烈钧坚持重兵攻粤,决不单是为护国军开辟大后方,而是有乘机扩充个人实力,为个人打地盘之企图。

护国军主要领导人三人三把号,各吹各的调,严重阻碍了护国战争的顺利发展。4月16日,蔡锷在致唐继尧、刘显世和戴戡的电报中,沉痛而无奈地指出:“某君(李烈钧——笔者注)竟率所部违命入桂,致令全盘计划为之牵扯动,深堪扼腕。”黄毓成也“屡次坚持己见,欲出会理,抱由宁、远取成都之定见”。这些错误行动,“使得增援计划,迄未能见诸事实,大足堕士气而失机宜”。万幸的是袁军此后没有发起大的军事进攻,否则,云南护国军必将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。

三、护国战争的战略转折点——叙泸之战

叙泸之战是护国战争中最激烈、最艰苦的一个战役。谈护国战争必提叙泸之战。在叙泸战场,护国军以不到敌人1/3的兵力,阻挡住了强大的北洋军的攻势,是在极尽艰难困苦的情况下,扭转危局,最终迫使敌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。这固然是护国军将士艰苦奋斗的结果,但也是与蔡锷的出色的战场指挥分不开的。

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于1916年1月14日从昆明出发,第三支队长董鸿勋所部作为先遣队早4天出发。蔡锷到毕节,董支队已到永宁。2月5日,董鸿勋与在永宁的川军第二师刘存厚会合,二人拟定计划,一同向泸州发起进攻。本来在出发前,蔡锷曾叮嘱董鸿勋,叫他不要冒进,不要打泸州,对刘存厚的川军,只能利用他搞些侧面的事情,不能依靠川军搞什么名堂。但董鸿勋求胜心切,不以蔡的话为然。

2月7日晨,“董、刘两部协同攻下泸州对面的兰田坝,乘势夺下月亮岩。月亮岩雄峙江边,地势高峻,在上面配制炮兵,可居高临下,俯击泸州。董鸿勋将兰田坝、月光岩交刘军驻守,自己率两营,从下游泰安场渡江攻击泸州侧背,驻泸敌军熊生旅,一面死守泸州,等待援兵,一面派兵利用夜幕偷渡长江,突袭月亮岩。守月亮岩的刘存厚猝不及防,仓惶退却,团长陈礼门羞愤自戕。这时,已越过泰安场,进抵到罗汉场的董支队,也遭到从重庆赴援的敌军吴佩孚旅的截击,不能取胜,遂从原路撤回。12日,泸州敌人倾巢出动,渡江进攻,将刘、董两部包围在纳溪安富街一隅,情势非常危急。13日晚,护国军何海清、王秉钧和朱德等支队赶到,马上投入战斗。朱德支队从小路夺占了纳溪东面高地莲花坡,打破了敌人对纳溪的包围。23日,蔡锷赶到前线,指挥全军分四路进行反击作战,禄国藩率一个营由黄土坡向兰田坝进攻,何海清率两个营沿永宁河右岸向双合场进攻,朱德率两个营附炮兵一连、机关炮一排由莲花坡向菱角塘方向进攻,刘存厚一部迂回渡江,对泸西龙透关取进攻态势,掩护正面反击作战。28日,从叙府来的两营援军相继参加战斗。于是,战斗在江安到兰田坝的广阔地区内展开,夜以继日,连续猛攻,多次短兵相接,相互肉搏,战斗十分激烈”。蔡锷说:“此三星期之剧战,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。”^[2](《致唐继尧等阳电》)由于敌人兵力居于优势,且又占据险要地势,护国军奋战多日,始终未能攻下敌阵地。在此困难的情况下,为了保存军力,待机破敌,蔡锷于3月6日决定全线撤退。以少数部队阻击敌军,而将主力部队撤至大舟驿、叙蓬溪(今护国镇)一线,构筑工事,整顿军队,催唐继尧接济弹药,准备伺机反攻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撤退时,蔡锷坚决弹压刘存厚师反奔的溃兵,稳住阵脚,指挥部队,“徐徐引退”,秩序井然地撤至指定区域,显示了蔡锷杰出的指挥才干。梁启超后来提起此事时曾说,“唯能败者,乃为名将”^[3](P146),这是不过分的。

护国军在大舟驿休整数日,士气复振,蔡锷决定对敌展开反攻。这次反攻是护国战争中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。3月15日,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,为主攻。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梁坝驿沿叙永河

向纳溪正面佯攻,为助攻。朱德、张熙两支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,以阻击泸州援纳之敌。蔡锷在命令中指出:“逆军极无攻击精神,我军对其正面只宜配备少数兵力,而以主力冲其侧背,彼自溃走。宜切谕诸将领务多留预备队在指挥官之掌握,俾便运用。”^[3](P135)即使今天来看,这种避实击虚、迂回抄袭的战术也是高明的,17日,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,连战皆捷,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。敌人凭借优势兵力,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。护国军各路终因弹药缺乏,补充不及,未能攻破敌人防线。蔡锷见各路战事僵持,恐敌抄袭后路,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,退到出发地,仍持守势。经此一战,敌主力“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,士兵损失过半,已无再战之能力”,张敬尧只得同意与护国军停战议和。

在这场战争中,蔡锷显示了他坚定的战斗意志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。整个叙泸之战中,蔡锷正患重病,“他瘦得像鬼。两颊下陷,整个面孔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。他正因肺病(后来诊断是喉头结核)而走向死亡”^[4](P135)。但蔡锷坚忍不拔,奋不顾身,讨袁将士们更是“士气坚定,上下一心,虽伤亡颇重,昼夜不得安息,风餐露宿,毫不为阻”^[4](《致唐继尧等廿九日电》)。

蔡锷在叙泸之战的战略战术,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。

首先,他在作战指示中,不注重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,而只着眼于攻城夺地,击溃敌人。他在第二次反攻纳溪的作战命令中强调:“纳城逆军如向兰田坝退走,勿遏其归路,宜从侧面猛击,使之溃走。”这种击溃战的战法,是军事上保守主义的表现。当然,就护国军总兵力而言,弱于敌人,不可能将敌人一鼓聚歼,但完全可以采取诱敌深入,迂回包抄的办法,把敌人分割开来,一口一口地吃掉,击溃战在任何战争中都都不是高明的战法,不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,就不能改变作战双方的兵力对比,就不可能完成攻城夺地的战略任务,就很难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。

其二,蔡锷身为第一军总司令,在作战中缺乏全局观念。在纳溪作战紧张的时候,只顾中路安危,不管叙府得失,竟两次从刘云峰梯团调兵,以至第一梯团的四个营先后被抽走三个营,仅留一营守叙,结果被冯玉祥军队击败,叙府陷落。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假若冯军占领叙府后,听从曹錕命令,乘胜直追,沿横江直捣云南腹地,或从高县迂回到蔡锷中路侧后攻击,护国军焉能不全崩溃。幸亏冯玉祥此时已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满,得叙后未再进兵,蔡锷才虽失策而未吃大亏。

其三,护国军的退却是保存军力、扭转战局的重要决策,遗憾的是提出这个决策的人偏偏不是蔡锷。当罗佩金、刘存厚“深以子弹不给,士气不扬,疲劳太甚为虑”,提出“非暂退不足以全师”的时候,蔡锷却“期期以为不可,退却之命缮定不发者屡日”^[2](《致李日垓何国钧函》)。后在众人催迫之下,蔡虽“屈于部曲之议,乃暂退”。但内心是不情愿的,认为诸将“熬不过最后5分钟,易胜扼腕”。说明蔡锷在作战指挥中还欠缺灵活机动的思想,还看不清进攻与退却的辩证关系,还不会运用“以逸待劳,后发制人”等先进的作战方法。这是叙泸之战中,护国军伤亡较大而战绩较小的原因之一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[1] 赵钟奇. 护国运动的回忆[J]. 近代史资料, 1957, (5).

[2] 蔡锷. 致梁启超一电[J]. 近代史资料, 1963, (4).

[3] 康恩畅.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[A].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: 10

辑[C], 1979.

[4] 史沫特莱. 伟大的道路[M]. 上海: 三联书店, 1979.

【责任编辑: 张天景】